

藏书大家郑振铎

□ 李秀潭

在我的藏书中，有一册郑振铎签名本《劫中得书记》。

《劫中得书记》是郑振铎在抗日战争期间，蛰居上海租界“孤岛”时撰写的一部著作。该书记载了他在抗战劫难中历尽艰辛抢救古籍文献的经历，包括访书所得、版本鉴定、内容评价等题跋、札记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

“孤岛”救书倾其力

郑振铎，我国二十世纪著名学者、作家，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，更是学界公认的藏书大家。

藏书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国古代藏书，源远流长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曰：“惠施多方，其书五车。”战国时已有私人藏书。两宋时，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，私家藏书遂成风气。明清两代，为藏书家之鼎盛时期。在此漫长历史进程中，藏书家为了搜寻各种孤本珍籍，甚至不惜倾家荡产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、风流儒雅的书林佳话。

藏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“痴书”。明代学者王世贞不惜以一座山庄换一部宋刻《两汉书》，历来为藏书界津津乐道。而郑振铎在抗日烽火中冒着生命危险，留在上海“孤岛”抢救收购图书文献，更为世人赞誉。

1937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后，上海除了苏州河以南的所谓英美等国的“公共租界”和法租界暂时未被占领外，其他地方都沦陷日军铁蹄之下。人们称这块四周被日军包围的暂未被占领的地方为“孤岛”。“孤岛”时期，因战乱遭兵火劫掠，诸书院、书局及私家所存之版片，或全部付之灰灰，或被损残缺不全。公私藏书遭劫，通衢之间，残书布地，不择价而售。亦有以双篮盛书，肩挑而趋，沿街叫卖，书籍存亡，同云烟聚散。更使郑振铎忧心如焚的是，大劫之后，文献凌替，诸多珍籍被北方汉奸官僚、伪伪机关，以及美日文化团体收去，流出国境。美国国会图书馆东部主任赫美尔（汉名恒慕义）称：中国珍贵图书，输入美国者，月以千计。自今而后，将来研究中国文化，或将以华盛顿暨美国各学府为研究中心矣。

为此，郑振铎赶写了一篇《保卫民族文化运动》，发表于茅盾主编的《文阵丛刊》卷首。他指出：中国民族文化历经创伤，大江南北文化损失惨重，为了子孙后代，为了将来中国的复兴，必须

开展保卫民族文化运动。在此期间，郑振铎除了必须到暨南大学上课外，其他时间几乎全部扑在抢救古书上了。他在后来回忆中写道：“夫保存国家征献，民族文化，其苦辛固未足辱攻坚陷阵，舍生卫国之男儿，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，得此千百种书，诚亦艰苦备尝矣。”正是在郑先生这种心专志一、手足胼胝、日无暇晷、节衣缩食的努力下，他和爱国学界著名人士组织的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同仁一起，收购了江南玉海堂、群碧楼、风雨楼、适园、嘉业堂等大量珍贵藏书。其中可进入高标准“善本”之库的就有4000种左右，已抵得上当时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平图书馆善本库的总数。现今台湾“中央”图书馆的善本书库，也几乎全是由他们当时抢救收购的。

郑振铎在上海“孤岛”时期大量抢救古籍文物一事，后来传到延安。国统区黄炎培、章伯钧、傅斯年等民主人士应中共之邀访问延安，同毛泽东、周恩来座谈。黄炎培先生关切地问及南方文物很多，应该如何保护处理。毛泽东当即插话说：“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。”这恐怕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任新中国首任文物局长的缘由。

辛苦十载购杂剧

郑振铎平生钟情于书。他在《劫中得书记》序中曰：“余聚书廿余载，所得近万种。搜访所至，近自沪滨，远逮巴黎、伦敦、爱丁堡。凡一书出，为余所欲得者，苟力所能及，无不竭力以赴之，必得乃已。典衣节食不顾也。故常囊无一文，而积书盈室充栋。”但他藏书，并不像古董收藏家那样为藏书而藏书，而主要是为自己研究直接或间接的需要而购书。他曾想刻两方图章，一方是“狂狷文献耗中年”，一方是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。对于古人、今人的著作，凡稍有可取或可用者，都“兼收博爱”。为了当时和将来研究工作所需，常有“人弃我取”之举。诸如自古藏家不甚经意之戏曲、小说、弹词、宝卷、大鼓词这类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古书，诗词、版画之书，印度、波斯古典文学之译作，亦常搜访于冷摊古肆，收入度架。

郑振铎着意收购的中国古代戏曲门类中，最关注元代杂剧。元剧是我国戏曲史上最光辉的一页，出现了关汉卿、王实甫这样堪与莎士比亚媲美、比肩的世界级戏剧大师。然而经历几百年改朝

换代，兵火战乱，风风雨雨，留存下来的作品却很少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郑振铎偶从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》上读到常熟藏书家丁祖荫一篇文章，透露丁氏藏有《古今杂剧》六十六册。看到此消息，他连忙写信给北平友人，追查此书踪迹，同时又拜托与丁氏相识友人询问丁氏。但丁氏告知此书已归还原主常熟旧山楼赵氏，他又问赵氏后人，回答“不知”。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中国书店老板电话告诉他，在苏州某书贾处发现此书，其中有刻本、钞本，钞本大多还有清常道人的题跋。郑闻后欣喜若狂。后经他与上海苏州书贾老板多次往返集议，最终为国家购下。他购买的这部书，不是一部普通的戏剧集。六十六册书中包含二百四十二种杂剧，其中有一半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；而这一百多种孤本中，元人所作就有二十九种。作家徐迟后来在报告文学《火中的凤凰》中曾写道：“你能想象吗？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！仅仅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一个签名，全欧洲为之骚动。如果发现的是莎士比亚的一个从未见过的剧本，你想，又将如何？试想，文艺复兴距今不过三四百年，我们的元代，至今却有六七百年之久。”他激动地指出，这一抢救工作，“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名著，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，而且在中国历史、社会史、经济史、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”。此发现，在近五十年来，“不下于‘内阁大库’的打开，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，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发现”。他当时对此书作了深入研究，定名为《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》，并撰写了三万余言长跋。直至1958年，他在主编《古本戏曲丛刊》时，还将这部“奇书”中许多原抄本影印进去，并在1958年10月17日，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飞机失事前两天撰写了序言，成为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。

合力编谱终完璧

郑振铎先生藏书的重要目的，就是在收藏图书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。在他一生中，不仅利用藏书编辑影印大量古籍，而且撰写出版了传世力作《文学大纲》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（共四册）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等论著。他最具代表性的巨著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，被专家称为“建国前最好的一部文学专著”。《中国俗文学史》涉及的内容及材料的丰富翔实，为以前同类著作如胡适的《白话文学

史》所远远不及。从此，在中国文学界确立了他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。

在编印古籍方面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，是他与鲁迅先生合作编选重印的中国木刻笺谱。郑少年时就喜欢看旧小说书前的“绣像”，20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后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时便留意刻本之插图。鲁迅先生对此也有浓厚兴趣，并由冯雪峰陪同，到他家欣赏他所收藏的明清版书籍插图。后来他又托朋友送鲁迅一盒印有彩色版画的信笺及信封。1933年2月3日，鲁迅收到他托周建人转送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前三册，对书中所收版画插图十分欣赏，终于引发鲁迅提出一个考虑多时的计划，建议与他合作编选笺谱。并称此事“实不独为文房清玩，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”。于是，他负责在北平琉璃厂各文玩店铺搜辑齐白石、陈师曾等名家笺纸，然后分批寄到上海，由鲁迅负责挑选，一起商定笺样选择、印刷用纸、版式大小、序目编排、预约定价、广告写法、请人题签等事宜，然后再寄回北平由他负责请有关店铺印刷。六册一套精美的《北平笺谱》在1933年底印出，他于1934年初将样书送给鲁迅。鲁迅十分高兴，并将此书分寄苏联、美国、法国、日本等国的图书馆和国内外友人。《北平笺谱》初版刚印好，他又向鲁迅提议重刻明代《十竹斋笺谱》，鲁迅力助其成，并亲撰《十竹斋笺谱翻印说明》。遗憾的是，鲁迅先生只见到《十竹斋笺谱》第一册，待第二册即将刻成之际，鲁迅先生却不幸逝世。之后，他继承鲁迅遗志，至1941年11月，终将两册印制完成，合为完璧。他认为：古代艺术的精品，大量地传播出去，作为新生创作者的“借镜”或“参考”，是很重要的事业。鲁迅先生与他合作编印的这两部笺谱，称为“刻的丰碑”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
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。人各有自己的生活轨迹、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。“有书真富贵、无事小神仙”，是中国历代学人向往追求的生活情趣。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外甥、藏书家徐乾学有一藏书印“黄金满藏、不如一经”，对比了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关系，为学界所称道。在当下物质化商业化风靡、休闲化娱乐化为时尚的今天，郑振铎先生这种求书、藏书、读书、写书的志趣及精神，值得国人认真思考并弘扬之。

未已斋札记



三顾茅庐

以图展、江山难以稳固。

刘备三顾茅庐，最终见到了诸葛亮。具体细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很精彩，在《资治通鉴》《三国志》里都是一笔略过：“凡三往，乃见。”于是便有了著名的《隆中对》。

刘备对自己认识深刻：“欲信大义于天下，而智术浅短，遂用猖獗（连遭挫折），至于今日。然志犹未已，君谓计将安出？”其实隐含的话没说，就是缺少大贤，却用这次问计的行动溢于言表了。诸葛亮便成了天下三分的大计：曹操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之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荆州乃“用武之国”，刘表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。益州“智能之士思得明君”。如果能占有荆州、益州，“结好孙权，内修政治，外观时变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”。

大贤的眼光，就是能够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，几句话就把天下大势看得一清二楚，同时更为刘备的大业画出了蓝图，指明了方向路径。后来的形势发展与局势大定，基本就是按此路线图确立的。刘备当时真可谓是茅塞顿开，与诸葛亮的情谊日益亲密，以致关羽、张飞不悦，刘备说：“孤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也。愿诸君勿复言。”

名”，曹操因此而拨给刘备军队及粮草以抗吕布。这一段情由，怎一个乱字了得。此时的刘备，可谓惨淡。原因就在于缺乏诸葛亮这样的大贤辅佐，所以只能东跑西颠。此时唯一可慰者，就在于他赏识的人才对他忠心耿耿。当初刘备在豫州时推荐徐州人袁涣为茂才，袁涣被吕布扣留后，吕布想让他写信辱骂刘备，再三强迫而不从，吕布以剑威胁，袁涣“颜色不变，笑而应之”，一番慷慨陈词让吕布“断而止”。这从一个侧面佐证，刘备所赏识的人才，都是金子而不是脓包。

刘备离不开诸葛亮

诸葛亮是山东琅琊人，寄居在湖北襄阳隆中。此时刘备正在荆州，向襄阳人司马徽寻访人才，于是才开启了刘备与诸葛亮的伟大相遇。水镜先生司马徽对刘备说：“儒生俗士，岂识时务，识时务者在乎俊杰。”于是推荐了卧龙与凤雏，即诸葛亮与庞统。

历史上，雄主与大贤的关系，名为君臣，实则为好友，二者相互依赖。甚至，是雄主有求于贤才更多，因为贤才未遇雄主，宁可“穷则独善其身”，即便终老乡野，也未尝不可自得其乐；但雄主未遇贤才，则大业难

正月十三日

文天祥

去年今日遁崖山，
望见龙舟咫尺间。
海上楼台俄已变，
河阳车驾不须还。
可怜瓶瓶烟横塞，
空想腾腾月掩关。
人世流光忽如此，
东风吹雪鬓毛斑。

望见龙舟咫尺间

□ 董泳洋

公元1280年正月十三的燕京即将迎来元宵节，这本是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，但此时文天祥的思绪早已远远地飘到极南的海滨，回到那场令他悲痛万分的战役——崖山海战。心如刀割、肝肠寸断的他在狱中提笔写下了这首七律。

文天祥虽然在诗里悲痛万分，但崖山海战发生时他什么也不能做，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宋军走向覆亡。不管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参与进去，去为大宋流尽最后一滴血，都无法付诸行动。所以这一次的主角并不是他，而是和他齐名、一同被后世誉为“宋末三杰”的陆秀夫和张世杰。

距广东省冈州（今新会）城南五十多公里有一个地方叫崖门，银洲湖的湖水由此汇入海中，同时每日潮汐涨落也从这里出入。崖门由东西两座山组成，西侧的叫瓶山，而东侧的便是崖山。崖山就是南宋最后的根据地，也是他们决定破釜沉舟与元军拼死一战的地方。虽然战役主要发生在海面上，并没有遗留下多少古战场的旧迹，但山上保存有后人为了纪念此战修建的崖山祠，祭奠那些忠贞不二、为国献身的亡魂。

1275年，元军分三路沿江江顺流而下，准备一举消灭南宋朝廷。元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兵锋直指临安。其间为了挽回败势，南宋曾集结大量战船和军队，由张世杰指挥，在焦山与元军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。张世杰错误地将战船连结为一体，致使元军火攻得逞，宋军损失惨重，再也无力全面反击。数月之后，都城临安就陷落了，谢太后和宋恭宗无奈投降。不过，南宋的抵抗并没有就此停止。文天祥、陆秀夫等人拥立恭宗的弟弟益王，继续号召各方抗元。不过由于意见不合，文天祥选择了带兵单独行动。在元军的追击下，张世杰护送着南宋小朝廷一路南逃，随行有二十多万军民。中途益王病死，因此又拥立了他的弟弟赵昀为帝，并转移到了崖山。

而独自领兵，没能和朝廷一起行动的文天祥为什么会到崖山来呢？不久前，他率领的军队在潮阳五坡岭遭到元军偷袭。文天祥自杀不成，最后被俘。随后元兵押着他来面见元军指挥官张弘范，张弘范希望文天祥给在崖山的张世杰写信，劝说张世杰投降。文天祥坚决不从，还写下了那首垂千古的《过零丁洋》表明心迹，张弘范见状便放弃原有打算，准备强攻崖山。而文天祥也就“有幸”见证了这一场异常惨烈而悲壮的战斗——崖山海战。

崖山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，进可出海御敌或逃亡海上，退也可据守内陆，张世杰的部下就建议扼守进退自如的崖山海口，以提高机动性。但张世杰没有采纳这条建议，他认为如果长期流亡海上，必将人心涣散，最后不战自溃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孤注一掷，壮烈战死。因此他让大家把千余艘战船连结起来，将沉重的石碇投入海中固定舰船的位置，然后在四周修建起楼棚，顽固死守。

起初元军统帅张弘范切断了宋军的水源后，如法炮制，也想用火攻来对付宋军。没想到张世杰吸取焦山之战的教训，在船的四壁涂上泥巴，还在四周绑上长木，元军的火船无法靠近，火箭落在船上也烧不起来，因此元军最初的进攻

以失败告终。可惜这样的一次小胜对于大局毫无改变，由于水源被断，船上的淡水很快就消耗完了。宋军将士被迫吃了十几天的干粮，没有淡水，渴得不行的士兵只好喝海水，结果上吐下泻。疲惫不仅严重削弱士兵的战斗力，连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。与此同时，元军以逸待劳，而且不断向崖山增兵。

终于张弘范觉得时机成熟了，便分兵几路发动总攻。一路由李恒率领，趁着早上的潮水向南退去的时机，顺势从北面进攻，张世杰命江淮兵死守。而另一路主力则是等到中午，由张弘范亲自率领，从正面进攻。张弘范命令用布遮住预先埋伏的船楼，等到两边舰船接近到一定距离时，鸣金为号，撤去上面的布。此时的宋军经过一上午的交战，疲惫不堪，又值午饭便有些松懈，一时之间被元军接连攻破七艘战船。张世杰知道败局已定，于是抽调中军的精兵乘坐十余艘战船突围离开。不料遇见飓风，船毁人亡。陆秀夫想要前去救援皇帝，可是皇帝所在的龙舟船体过于庞大，而且与其他船只相连，无法走脱。宋朝的皇帝已经投降了一位，绝不能再让末帝落在元军的手里，使宋朝蒙受更大的耻辱。因此陆秀夫背着年仅八岁的宋末帝从船上一跃而下，溺死海中，后来连遗骸都没有找到。这时候最悲壮的一幕出现了，剩下的军民见状，虽然已无力抵抗，却也不愿投降做亡国之奴，因此纷纷投海殉国。数日之后，海上竟浮起了将近十万具尸体。

崖山海战是宋元两大政权之间进行的最后一次大战，以宋的全面失败告终，也宣告了赵宋政权的彻底灭亡。至于陆秀夫，他亲手杀了皇帝，却被后世誉为忠臣。粗看极为荒唐，其实有它的逻辑在。古人常说“身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它对皇帝同样适用。而这个节就是在国亡之际为这个国家、这个政权保留最后的尊严，亦即殉国。皇帝是一个国家的象征，他受辱就代表着这个国家受辱，而这是忠臣们最不能接受的事情。因此文天祥发出“河阳车驾不须还”的感慨，除了说末帝沉海，也暗含对身在大都、苟且偷生的恭帝的不满。当然，末帝只是一个八岁的孩童，这份责任也是别人强加给他的。后人可以以今天的观念来指责陆秀夫残忍，但是完全超越时代立场的判断到底有多少价值，便只能见仁见智了。

地方志

选人用人史话

少而精用而信

刘备用人史话（上）

□ 陈家兴

刘备虽然号称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，自己却不过是靠贩卖草鞋为生的草民。仅凭这一点，刘备就与曹操、孙权不在一个起跑线上。孙权自幼就有家业可承，曹操的父亲曹嵩好歹还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。相形之下，刘备就更有传奇色彩。而助其成事的，当然就是些贤能之士。从刘备的用人谋略看，走的显然不是曹、孙的多多益善路线，而是少而精的策略。

他赏识的人才，对他忠心耿耿

刘备与关羽、张飞在年轻时就交情深厚，有桃园三结义，正史无载。但三人的情谊非同一般，却是青史有誉。关张可谓德才兼备，二人无论是领军还是独战，俱是一把好手。其后，刘备又得常山赵子龙。赵云当初投奔的是公孙瓒，刘备“见而奇之，深加接纳”，至于如何“深加接纳”，正史也无载，如《三国演义》般演绎，或在情理之中。于是，赵云便随刘备，为其统领骑兵。于刘备而言，这是挖了别人的墙脚，于赵云来说，则是择主而事。纷乱年代，这种事常常发生，贤臣择主而侍，而庸主多不识才或不才，欲让贤才愚忠于他可能性不大。

公元194年，刘备救援徐州牧陶谦，陶谦上表推荐刘备担任豫州刺史，后陶谦病逝，刘备便兼任徐州牧，至此也算是稍有立锥之地。第二年，吕布被曹操击败而投奔刘备，但吕布这等勇士，刘备却看不上。显然，吕布属于那种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却无大谋而又品行很差的人，这种人怎能入刘备法眼？

刘备在徐州没安穩两年，便于196年被袁术、吕布合谋而攻，徐州被吕布占驻，吕布又反过来要求刘备和他一起进攻袁术。后来吕布虽解了袁术攻刘备之围，却又因见刘备集合起万余人部队而觉威胁，再转头攻打刘备。其后，才有刘备败走而奔曹操，才有有人劝曹操杀刘备，又有郭嘉劝曹操别杀，否则会得“害贤之